

正確評價中國大學績效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日前發布了《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報告對教育部直屬的七十二所高校中的六十九所進行的績效評估顯示：近半數高校在2006—2008年三年間呈現出「高投入低產出」的特點，僅有二十九所高校呈現出「產出大於投入」的較高效益。

大學作為傳承科學知識的教育機構，和企業一樣，其實也是要講績效的，只不過，企業講的是經濟方面的績效，而大學講的是人才培養方面的績效。然而一直以來，我們卻鮮有人對大學績效進行專門評價，以至於有些人產生了大學無所謂績效的錯覺。從這層意義上來講，《中國高等學校績效評價報告》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說，開了一個好頭。

但是，《報告》本身卻又叫人倍感遺憾，提不起精神。請注意，我並不是對大部分大學「高投入低產出」的結果感到失望，儘管這種結果早就成為了事實存在，並且為人所公認，而是對產出的指標表示懷疑。比如該《報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袁振國介紹，產出指標涉及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數、出版專著數、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特等獎數、發明專利授權數等十六項。我於是忍不住要問，大學從本質上來講到底是科研機構還是教學機構呢？

以發表論文、出版專著為主要特徵的產出指標，暴露出這樣的問題，人們都知道對大學進行績效評價很有必要，可就是找不到合適的指標，於是就把論文和專著數量等膚淺指標拿出來湊合。這樣一來，評價倒是有了，可就是難以服衆。這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以論文發表數量為主要依據的科研和職稱評價體系。公衆的普遍認識是，論文發表得多並不等於科研水平高，同樣道理，發表論文多、出版專著多並不等於高校的績效就高。以倍受詬病的標準為標準，其得出的結論當然站不住腳，得不到普遍認可。

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是皮，而大學績效評價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於大學績效評價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出有說服力的指標，讓大學績效評價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之上。由於敎育育才是大學的根本宗旨，國家對大學進行大量投入，其第一產出和最主要產出理所當然的應當是畢業生的質量。培養不出一流的學生，哪怕是最後的論文、出版再多專著，大學都沒有多大的績效可言。

進而言之，如果做不到以學生質量為基礎來建造大學績效評價的大廈，那麼，就不要弄什麼大學績效評價報告之類的幌子。

貧困生的命運

□禾 刀

近日，上海海事大學女研究生楊元元在宿舍自殺身亡。楊元元是湖北宜昌人，六歲時父親因病去世，當時弟弟尚不滿四歲。多年來，母親一人含辛茹苦將弟弟倆拉扯成人，求學期間楊元元一直與母親同吃同住。楊元元自殺前一天感嘆「知識改變命運」。從事件來看，學校拒絕楊元元母親進入學生宿舍居住，成爲壓倒楊元元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身處貧困之中的楊元元，儘管生活異常困難，年齡偏大，沒有穩定收入來源，她仍然堅定選擇繼續深造，期望有一天，學富五車後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然而，在現今這個知識與體現實際社會價值缺乏有效鏈接渠道的社會面前，知識與自己的社會崗位仍舊相隔甚遠。就算楊元元知識再淵博，並不表明她就一定擁有所謂知識轉化爲能力的機會。

貧困生的種種擔心，歸結一點便是上升通道太過狹窄。雖然建立了一些傾向於貧困生的扶助機制，比如助學貸款等，確實也解決了一些貧困生的實際問題。但這些機制過於剛性，相互之間缺乏有效銜接，以致顯得有些冰凍。尤其是那些邊緣地帶的少數學生，單一的扶助機制並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急需問題。

就楊元元一事而言，她的學業問題學校或可通過相關機制加以解決，但其母親的生存問題顯然不是學校能夠承載的，那麼，到底應由誰來解決這位老人的生存問題呢？遺憾的是，面對這個問題，楊元元沒能找到答案，這或是悲劇的真正根源。

多管齊下加強金融安全

蔡英文小心把氣球吹爆

□魯 力



民進黨領導人應該更深一層思考：李登輝執政晚期的兩岸政策、陳水扁執政八年的兩岸政策，已經一再殘酷地證明了劃地自限、對大陸封鎖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的傷害有多深。「台獨」可以猖獗一時，但「台獨」卻會讓台灣人民餓肚子。氣球吹得太大，總有一天會吹爆的！

選舉一結束，有些綠營人士就洋洋自得，宣稱民進黨已經走出陳水扁的陰影，可順利進軍明年的五大直轄市長選舉，並「有信心」衝向二〇一二年的「總統」大選，「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等等。這真是自我膨脹。民進黨何以因一次僅佔四成選民的地方選舉勝利，就大言不慚地說「已走出陳水扁的陰影」？陳水扁在主政時貪了台灣老百姓這麼多錢，並藏匿海外，民進黨迄今仍未與陳水扁作切割。如今，綠營人士公然說民進黨已走出了陳水扁的陰影，人們不禁要問：是台灣人民太寬厚，還是綠營人士的臉皮太厚？

「藍大綠小」格局沒變

這次「三合一選舉」藍營得票下跌，與馬英九對陳水扁縱容關係極大。清廉，對馬英九來說是吸引民衆的最大因素。但是，這次藍營卻不把選票還給在牢獄裡的陳水扁，卻讓人想起對貪瀆清除不力的馬英九。本來，馬的清廉必須和扁的貪瀆相比較，才能襯托出清廉的重要性。但是，馬政府卻由於對扁家貪瀆案偵辦腳步過慢，且集中調查的範圍限制在扁家的海外藏金，使得扁案就是扁及家人、幕僚涉案，過去在扁政府爲官的其他綠營人士並未捲入其中。雖然民進黨和扁有連結的贖帶，但扁貪瀆的因素並未成爲藍營攻擊民進黨的炮彈，反而成爲民衆對馬政府的不滿因素。只要扁案繼續無限期拖下去，時間一久，當民衆對民進黨的同情升高時，扁因素不但不成民進黨的包袱，反而變成馬團隊的政治負擔。

其次，這次的地方選舉，「藍大綠小」的格局並沒有根本改變。但是，在綠色輿論中，僅輸了一個縣的馬英九倒成爲了「崇禎皇帝」，而僅增加了幾個百分點選票的蔡英文，倒變成了「朱元璋」。國民黨這次在十七個縣市中得十二席，三分之二佔據；從得票率看，國民黨比上屆縣市長選舉低了近百分之二的選票。雖與民進黨的得票率拉近了，但如果算上違紀參選的國民黨人士所分走的藍營支持者的得票率，國民黨的總體得票率應在藍營的基本盤之內。因此，此次「三合一選舉」民進黨充其量只能算「得勢不得分」而已，台灣政治版圖並未由此發生顯著位移甚至歷史性劇變。

其三，這次選舉絕對不是對兩岸關係民意的解讀。台灣形成兩黨競爭局面，對政治民主化是正面發展。可怕的是，蔡英文或民進黨對這種民意作錯誤解讀，並且用來對付兩岸關係。據一家媒體民調，蔡於去年十一月陳雲林來台之後，不滿意度爲四成三，滿意度三成二。

今年五月，蔡發動所謂嗆馬保台遊行後，不滿意度爲四成六，滿意度爲二成七。這次選後，蔡滿意度首次超過不滿意度，爲四成三比二成四。陳雲林來台時，蔡英文帶頭製造社會衝突，輿論一致抨擊。所謂嗆馬保台遊行，再度引起社會不安。因此，在這兩次事件之後，蔡的不滿意度都超過滿意度。可見台灣的主流民意高度期待社會安定。

「劃地自限」傷害台灣

十二月中旬，「江陳會」即將在台中市舉行，民進黨規劃在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抵台前發動遊行，「獨派」社團更揚言要動員抗議。「陸委會」已表示，這次「江陳會」不會談ECFA，綠營若仍將反對簽ECFA作為抗議主軸，正當性勢必不夠充分。這一次選舉，民進黨就一直意圖把馬政府準備與大陸簽署的ECFA，賦予公投意義，蔡英文特別選在傳統的農業縣嘉義縣，與張花冠共同舉行記者會，表示若政府不簽ECFA，張願意退選。結果張花冠以壓倒性的票數勝出，外界因此解讀民間確實對ECFA存在疑慮。

現在問題是，這次選舉是一場地方選舉，而且是以農業縣市及離島爲主的局部性地方選舉：十七個縣市佔總人口數的四成，三成不到的經濟生產力，也就是ECFA簽署後可能受衝擊最嚴重的縣市。如果因此詮釋成民間反對ECFA，實有擴大解讀之嫌。事實上各種民調顯示，超過五成的民衆是支持簽訂ECFA的。民進黨繼續抵制ECFA，就代表着民進黨在發展台灣經濟與「台獨」意識形態之間的某種選擇。民進黨領導人的每一次選擇都將象徵着「台獨」勢力與台灣社會經濟發展關係的某種再定位，當民進黨選擇意識形態時，台灣經濟就受一次傷害。當然，民進黨領導人會反駁說絕無此事，他們可以信誓旦旦的保證，台灣在過去沒有依賴大陸市場，還不是照樣經濟快速發展，近來正因爲與大陸經濟交流過密，反而讓台灣陷入經濟危境。

民進黨領導人應該更深一層思考：李登輝執政晚期的兩岸政策、陳水扁執政八年的兩岸政策，已經一再殘酷地證明了劃地自限、對大陸封鎖的兩岸政策，對台灣的傷害有多深。台灣今天的經濟發展困境

，民進黨真以爲可以推到才執政一年半的馬英九頭上？其始作俑者，其實爲李登輝與陳水扁。民進黨迄今爲止的兩岸政策，基本上建立在二十年前對中國大陸既有形象的認知上，這個認知的核心觀點就是大陸貧窮、落後、封閉，在國際社會遭全面抵制。同時，民進黨對台灣的認知，基本上也停留在二十年前。

認清兩岸關係形勢

其實，民進黨如果看不透兩岸關係的變化，可以參考一下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美中政策。在回顧中美關係近十年的發展變化時，我們還記得，本世紀初小布什上臺時表示，要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美國政府的這種強勢干預中國內政的思維，曾一度使得中美關係面臨全面攤牌的境地。如今，新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時卻表示，美國不謀求遏制中國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表示樂觀其成的態度，不反對兩岸和平往來。這是過去所沒有的。長期以來中美間戰略力量對比嚴重不對稱的局面有所改變，由美國單方面定義中美關係的時代已經過去，雙方關係需要雙方來共同定義。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說：「比起軍備，經濟更是能保衛台灣人的籌碼，面對崛起的中國大陸，任何有心要引領台灣迎向世界的政治家，都必須對中國大陸有充分認識，才能不五體投地、毫無保留的傾心，卻也不能面對中國大陸就是一味反對到底。」許信良的話很值得蔡英文去思考，「台獨」可以猖獗一時，但「台獨」卻會讓台灣人民餓肚子。氣球吹得太大，總有一天會吹爆的！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中國大城市的樓價居高不下，老百姓無法承受，已經成爲影響社會安定的問題。普通收入的民衆如果不能安居，也就不能樂業；例如上海的平均樓價已經接

近東京，但是上海市民的平均收入只有東京的十分之一，可見一斑。

目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採取有力措施，在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加強市場監管，穩定市場預期，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勢頭。爲保持房地產市場的平穩健康發展，國務院要求，按照穩定完善政策、增加有效供給、加強市場監管、完善相關制度，繼續綜合運用土地、金融、稅收等手段，加強和改善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首先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有效供給。適當增加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賃房用地供應，提高土地供應和使用效率。在保證品質前提下，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設。

這說明，中央政府抓住了樓價高漲的根本原因。內地房地產市場受香港影響但又片面借鑒香港經驗，可以看到內地大城市樓價的制度性根源。

為經濟適用房預留土地

中國房地產業的真正發展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在此之前不存在市場意義的房地產。房地產業的大發展，是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開始的，從起步開始，就借鑒香港的房地產業發展經驗，香港的業者從開始就進入內地市場。香港房地產業對內地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入的，如果撇開香港因素，內地的房地產發展史就無從寫起。

從政府批租和拍賣公有的土地使用權、地產商用拍得的土地作爲抵押向銀行貸款、住宅興建的同時開始出售（樓花）、民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住宅（按揭）、住宅的設計與管理（物業）、二手房的買賣等等，從名稱到內容，香港的房地產堪稱內地市場的啓蒙者與教師。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開始，一些沿海大都市借鑒香港的做法：由政府大規模批出土地使用權，交由地產商開發與建設各種商品住宅與辦公樓，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模式，也爲民衆所熟悉。

然而目前內地的房地產業以及更廣泛的城市建設，與香港相比，還存在一些明顯的不足。

首先，香港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大規模發展房地產時，政府就有意識地從源頭，也就是土地批租，引導公寓與私人住宅兩個市場的同步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共只有一千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可以居住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香港人口七百萬，居住於公屋與私人住宅的大約各半。因此，儘管香港的樓價持續上漲，私人文炒賣之風歷來很盛，但是香港民衆一般並不恐慌，因爲社會階層不同，低收入階層買不起私人住宅，但可以通過申請和隊列租住公屋或購買較便宜的居屋，這方面有嚴

格的可操作的制度。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卻沒有被內地普遍借鑒，內地城市沒有從起步階段就預留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以至於現在好的、較好的地段已經全部賣出，這是內地大城市樓價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也是經濟適用房無法大規模推出的根本原因。

抑制利益集團高額利潤

內地城市特別是京滬等特大城市，已經形成了政府批地、地產商開發高檔住宅的模式。這一模式凝聚了強大的既得利益，能否抑制這些利益集團的超高額利潤，讓民衆也能買得起、租得起經濟適用房，是各級政府要認真解決的重大問題。

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創造財富，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也被不少國家和地區所借鑒；然而香港房地產發達的弊端也顯而易見：私人住宅和辦公樓價格高，導致香港經營成本高，這已經成爲香港經濟轉型的一大障礙。經營房地產業的大財團對整個社會經濟的影響太大，以至於尾大不掉，也是香港社會畸形的一個方面。北京上海等城市如果也沿用這一模式，則高樓價對經濟發展的副作用，一定會逐漸顯現。

其次是內地大城市在發展房地產的時候，沒有從一開始就將城市的軌道交通與城市的住宅建設配套規劃，而香港是很注重這種協調的，因此香港的公共交通特別是軌道交通非常發達，各地區之間的交通便利，這也是香港房地產業與城市建設的特點。北京以奧運會、上海以世博會爲契機，大力推進軌道交通建設，雖然已經遲了，但仍然是必要的。否則私人轎車越來越多，將使市民出行非常不便，城市交通管理混亂，並形成一個怪圈。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沒有經濟安全，也就沒有國家安全。

那麼，金融安全的內涵究竟是什麼？中國目前面臨着哪些金融安全的短板？我們應如何加強中國的金融安全？種種問題需要明晰的回應。

「安全」內涵已經擴寬



每年冬季，內蒙古滿洲里氣溫低於零下20攝氏度，一片冰天雪地。圖為12月13日一位滿洲里邊防檢查站的戰士冒着嚴寒在中俄界碑前執勤。

□蔡 亮

除進一步完善銀行業電子平台的國有化程度之外，要加強中國的金融安全，還必須做到：

(一) 堅決抵禦境外熱錢。要攔截貿易形式的「熱錢」。監管當局應當對進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始終保持密切關注，以便有效識別一些進出口商低報進口、高報出口的行爲。尤其是，對於那些進口單價明顯低於國際市場價、出口單價明顯高於國際市場價的進出口貿易，監管當局應當從嚴審批。

要警惕短期密集交易帳戶。監管部門應當對那些短期密集交易的銀行帳戶保持足夠的警惕。從特徵上來說，多個銀行帳戶與少數甚至單個銀行帳戶進行短時期的密集交易往往意味着資金正在流入地下錢莊。銀行應當將此類異常帳戶及時列入監管名單，並聯合外管局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堅定金融創新步伐

(二) 完善外匯資產配置。要調整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按照「一籃子貨幣」的人民幣匯率政策，逐步加大歐元、英鎊、日圓等非美元貨幣的比重，努力削弱美元指數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顯著影響。

要優化外匯儲備資產結構。加大對短期美國國債的投資力度；將一部分外匯儲備用於購買資源型產品如石油等大宗商品；還可將一部分外匯儲備用於投資國內成長性較高的企業或購買國外高收益型企業的股票，斬獲中長期收益。

需要特別補充的是，在加強金融安全的同時，貨幣當局切忌過度遏制金融創新。事實上，與美國相比，中國面臨的恰恰是金融創新嚴重不足、金融監管相對過度的問題。中國貨幣當局固然要努力總結美國在金融監管領域的失誤，但同時更要堅定金融創新的步伐。畢竟，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無數次地證明，唯有體制的變革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中國經濟的潛力。

加強中國金融安全，不走回頭路。

回答什麼是金融安全，首先應了解什麼是金融。

經濟學家陳志武先生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把金融定義爲「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進一步而言，「所有涉及到價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之間進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

當然，隨着現代金融業的飛速發展，尤其是以級債爲代表的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創新，「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形式日趨複雜，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拓寬了金融安全的內涵。今時今日，從嚴格意義上講，貨幣資金的流通安全已不足以覆蓋一國整體的金融安全狀況，金融安全在廣義上應表述爲一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即一國銀行業、貨幣和股票市場整體處於安全狀態。

研究金融安全的豐富內涵，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我們不難發現，現階段，中國的金融安全至少存在三塊短板：

其一，熱錢「回歸」仍未受到有效遏制。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今年二季度，難以通過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及歐元對美元升值的估值效應等因素解釋的新增外匯儲備爲879億美元。中